

德阳市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輯

紀念 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 特輯
解放戰爭勝利36周年

政協德阳市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一九八五年十月

PDG

德阳市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
解放战争胜利36周年特辑

政协德阳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抗日战争时期德阳、罗江两县中共党组织的

建立及抗日救亡运动史略

……………中共德阳市市中区区委党史工委办公室(1)

德阳、罗江两县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

国立六中四分校党组织的建立及抗日救亡运动

罗江县的抗日救亡运动

罗江普育小学的抗日救亡运动

国立六中二分校党组织的建立及抗日救亡运动

德阳中学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中江县地方党组织领导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片断

……………中共德阳市委党史办公室供稿
陈俊安、胥正荣整理 (28)

一所读书不忘救国的革命学校——国立六中罗江分校

抗日救亡活动综述

……………中共德阳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中共德阳市市中区党史工作委员会 (34)

出川抗日亲历记……………李 辉 (55)

抗战时期我在川军中参加滕县战役和随枣战役的回忆

.....谭本栋 (68)

关于礼广贵、张孝先等同志在绵竹、德阳、罗江、金堂

开办和平书局的评述

.....中共德阳市市中区党史办公室 (78)

抗日战争时期在地下党领导下我在四川进行革命工作的

情况——节录有关和平书局一段.....礼广贵 (81)

关于和平书局的一段回忆.....张孝先 (88)

我所知道的德阳胜利书局.....张孝理 (99)

回忆建国前西川书局及其分店的活动.....冯争先 (109)

德阳和平书局被查抄前后.....赖成松 (112)

关于开办和平书局——胜利书局的经过

.....卢尔庄初稿、周映碧整理 (117)

“两航”起义与爱国主义.....郭建伦 (122)

冲破黑暗，飞向光明——驾机起义36周年的回忆

.....张祖礼 (144)

解放后的枪声——平定三〇二师叛变记

.....什邡县人大 杨文渊 (159)

抗日战争时期德阳、罗江两县 中共党组织的建立及抗日救亡运动史略

中共德阳市市中区区委党史工委办公室

(周映碧执笔整理)

一九三六年的“双十二事变”和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最终迫使蒋介石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同意了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的主张，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此，广大国统区人民长期被压抑的抗日爱国热情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抗日救亡运动得到空前的发展。

但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统治集团，深怕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的发展下去危及其生存。不久，他们又推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针，使抗日救亡运动遭到了严重的打击。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这样，才把国民党抑留在抗战阵营中，勉强维持了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直到抗日胜利。

德阳、罗江两县的抗日救亡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循着一条低潮——高潮——低潮的曲线发展的。

德阳、罗江两县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

一九三八年初，山东省大部份县已沦陷，伪山东省教育厅命山东境内所有中等学校学生和教员南下流亡。二千余名中学生集结于河南南阳赊旗镇，定校名为“山东联合中学”。不久，平汉线上的国民党将领刘峙大踏步撤退，郑州岌岌可危。国民党教育部又令“山东联合中学”迁往湖北汉水之滨的郧阳、均县，改名为“湖北中学”。约半年之久，由于京、津、沪、宁相继沦陷，长江南北均成战场，整个中国东半部烽烟遍野，血火流光。此种形势下，年纪稍长的一些高中、后师学生，激于民族义愤和救国热情，纷纷奔赴抗日中枢延安。一九三八年夏，日寇日益猖狂，血洗南京之后，又溯江而上，武汉告急，郧、均两县亦危在旦夕，伪教育部遂令该校速迁四川。数千名男女师生，于一九三八年隆冬，徒步跋山涉水奔赴四川。他们经安康，过汉中，攀巴山，越剑门，艰辛备尝，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到达川北重镇绵阳，历时一个多月，行程二千余里。

该校抵达四川后，奉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之命改名为“国

立第六中学”。校本部设立在四川绵阳，一分校设在梓潼，二分校设在德阳，三分校设在绵阳新店子，四分校设在罗江。

几千名流亡中学生，最小的只有十一、二岁，流亡七千余里，徒步跋涉二千余里，离乡背井长途跋涉之苦，不仅锻炼了他们的意志，更激起了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的热情。他们到河南南阳赊旗镇后，自发成立了各种抗日宣传团体，如济南一中李广田、瞿亚先领导的“狂飙剧团”，济南高中的“鲁声话剧团”。凡是逢场，就在河坝、街头、庙宇等地演出，观众人山人海。该校转移到湖北郧阳后，师生抗日热情更为高涨。除“狂飙剧团”、“鲁声话剧团”外，“黑白剧社”、“海曲歌咏队”、“中小学教师战地服务团”等也相继成立。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塞上风云》、《古城的怒吼》、《保卫芦沟桥》、《一片爱国心》等剧目。从湖北郧阳到四川的途中，剧团充当前导，每到一个城镇就要义务公演一次，激起了广大观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敌忾同仇，七千里流亡，把抗日救亡的火种撒播在广大苦难的中国土地上。

各种抗日救亡壁报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如“平平壁报社”、“漫画社”、“星火”等，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介绍解放区情况，深受群众欢迎。后来李广田先生创办的《锻冶厂》月刊上登载的《狂飙剧团二千五百里移动公

演记略》和《在风沙中挺进》以及《七千里征途》等著作，正是这段征程的写实。他们一边宣传抗日，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或进步书籍。组织各种名称的读书会。其中，著名的“野军读书会”就是从湖北流亡到四川途中成立的。他们从流亡中所见所闻，从《新华日报》和其他革命书刊中找到革命的真理。到达绵阳后“野军读书会”就召开了全体成员会议，推选读书会负责人朱鸿恩为代表，向成都、重庆新华日报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写信，向党表达他们的爱国热忱和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的心情，和要求参加共产党的决心。以后又多次写信和去人联系，终于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一九三九年十月，中共成都市委派侯方岳同志到三台中心县委任书记，新华日报馆向侯方岳同志提供了这一情况。侯到职后即到德阳、罗江两地考查了解，先后在二、四分校发展了党员，建立了组织。

三十年代从德阳、罗江两县到成都读书的青年学生，在省城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熏陶下，为追求进步、追求真理，有的排除重重干扰徒步跋涉奔赴陕北延安，如钟澄澈（三次奔延安，不惜讨口叫化，历尽千辛万苦）、舒增才（现名毛星）、谢长琮、尹显玉、王朝华、周亨达、谢延彪、邓虎章、谢曼秋、黄大明、李蔚章、孔淑婉、张桂根等。

有的就地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加入党的组织如李萧尚、肖孚邦等。他们利用寒暑假回乡的机会，广交进步青年，传阅进步书刊，议论国家大事，宣传抗日救亡，并从进步青年中物色党员对象，为发展壮大党的组织穿针引线。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情况，三台中心县委书记侯方岳便于一九三九年十月亲自到德阳、罗江两地进行考查了解，于是年十二月左右，在德阳、罗江两地发展党员十四名，建立了党的组织。计有德阳，国立六中二分校支部，党员六人；德阳中学党小组，党员三人；单线联系的党员二人；罗江，国立六中四分校党小组，党员三人（三名党员教师分别由成都市委、三台中心县委单线联系，未计入内）。组织建立后，侯方岳同志指定卿三俊同志（利用他当医生的身份和私人开诊所的条件，以便于掩护）为联络员，德阳这边的组织关系都通过卿三俊上下联系；罗江四分校由侯方岳直接联系。直到一九四〇年六月侯方岳同志调成都市委以后，沿川陕公路几个县的党组织关系，全部移交给川北工委饶孟文同志，不久饶调离川北工委，又移交黄友凡同志。一九四一年二月，三台县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心县委黄友凡同志转移到中江县工作，他负责的一部份党的组织关系又交到川北工委书记李维同志手中。

德阳、罗江两县建党以后，经历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反动派对抗日民主运动的压制和迫害日益猖狂。从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开始，党员和进步学生就相继被迫转移，有的被学校宣布开除或勒令退学，到四一年下半年已所剩无几，因毕业升学，最后，只剩党员卿三俊，而他又于一九四二年六月被捕。德阳、罗江两县的党组织及其活动终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下暂时中止。

国立六中四分校党组织的建立

及抗日救亡运动

国立六中四分校的前身是国立山东济南一中，校长孙维岳（又名孙东生）政治上比较开明。他是蔡元培的得意门生，是自由民主派。他渴望民主、进步与自由，对国土沦丧无比悲愤，痛恨腐朽的反动统治。他为人正直，对学生爱护备至。在办学培养人才上，他主张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自由读书，自由讲学，孔孟之道可以讲，马列主义也可以讲。在进步教师李广田老师的引荐下，一九三九年，他先后接纳了方敬、陈翔鹤、陶稷农三位进步教师（都是共产党员），到该校任教。使该校的抗日救亡运动一开始就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李广田老师也是北大学生，是现代著名文学家、诗人、教授。当时在四分校任国文教员，倾注了他全部心血。他善于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地把古今中外文化宝库中的许多知识传授给学生。他精心选用中外名篇和现代进步作家的文章，甚至选用革命作家的文章作教材，印成“国文讲义”。重点讲授的教材是鲁迅、果戈里、高尔基和收入《苏联作家七人集》中的作品。通过讲授鲁迅及其作品，让学生扼要了解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不仅让学生懂得如何作文，更重要的是懂得如何做人。他教学生，“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要敢哭敢笑敢说敢骂敢打”，“路是人走出来的”，“惟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未来”……。在讲《苏联作家七人集》作品时，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介绍了十月革命和革命者勇于献身的精神，激励大家去为真理而献身。

著名文学家陈翔鹤，诗人方敬和陶稷农等国文教师也都抛开国民党当局统编的法西斯奴化教材为学生讲进步文学作品。如苏联的《铁流》、《静静的顿河》以及鲁迅、瞿秋白等的作品。

经过长途跋涉而又广泛接触社会的流亡学生，在李广田等老师的诱导下，对真理的追求如饥似渴。自由读书、自由结社、自由出壁报已蔚然成风。校内墙报琳琅满目，街头大

众救亡墙报形式多样。李广田老师亲自上街阅读，定期在全校师生集会，评比公布名次。各种名称的读书会如“火炉”

“火花”“火焰”“抗生”，非常活跃。特别是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由李广田先生发起创办，陈翔鸿、方敬协助编辑的《锻冶厂》月刊（共出版十期，于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停刊），它在团结教育进步青年，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方面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当年的小作者，大多数已成为今日文化战线上的中坚。

《锻冶厂》的名称是李广田先生取的。他在发刊词中写道：“对于我们，这伟大的时代是一个最好的锻冶厂，我们将在这工厂中锻冶我们自己。我们一方面要锻冶我们的手艺，希望能为这抗日建国的伟大时代画一些光荣的记号；一方面更要锻冶我们的整个生命，使我们的力量变得更加坚强，更有耐性，以期为国家民族多尽一些应尽的责任。而且，如果我们手经过长期的锻冶之后，能产生出一种较为象样的作品来，那就再好没有的了。……因此，我们就出版了这个刊物——“锻冶厂”。

李广田、陈翔鸿、方敬三位作家带头写出作品在《锻冶厂》上面发表。李广田先生先后发表了三篇《和青年同学谈创作》、《旧形式利用》和《母与子》。陈翔鸿先生发表了

《论读古书》、《关于科举、读经和作文》、《谈谈当前的国文教师》、《怀“静静的顿河”译者赵广湘兄》、《“在风砂中挺进”书序》等五篇；方敬先生发表《谈诗歌》、《一个伤兵》、《一个礼赞》三篇。陈翔鸿先生连续三篇都是大声疾呼反对让青年只读古书，这是继鲁迅先生之后，再一次“救救孩子”的大声呼吁。他不是完全反对青年读古书，而是反对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把青年关起来强迫读经，以复古开“倒车”。

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蔡志勋在他写的《学习伟大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要拾起他的武器来，向着大众所憎恨的黑暗那方面进攻，争取人类的光明。……在争取自由解放战争的今天，我们只有全部接受鲁迅先生所指示的战斗目标，踏着他的足迹，更加紧地担任起我们在今天应有的任务和使命来，站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不断地努力学习、工作、战斗。”这篇铿锵有力颇犀利的文章发表在《锻冶厂》第七期上。

第二期登的一篇《狂飙剧团二千五百公里公演纪略》作者是这个剧团的演员、四分校的学生王保庸（现在的戏剧家田庄同志）。这篇文章记叙了这支由济南一中二十多个同学组成的流亡演出队伍，他们从河南睢县开演，一路行军，

一路演出，走遍了汉水上游各地和陕南农村，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经历。

《七千里征途》诗集和《在风砂中挺进》（散文），是由李广田、陈翔鹤老师组织同学为反映七千里流亡实况集体创作的两本未能出版的书。《锻冶厂》第四期和第八期登载的孙东生为《七千里征途》集体创作代序和陈翔鹤为《在风砂中挺进》序，介绍了这两本书如何叙述二千多名青年在流亡中的可歌可泣的史实。

六中二分校的朱鸿勋（即现在的文艺评论家朱寨）时年仅十四岁，写了一篇《麦子秀穗的时候》的小说，在《锻冶厂》第五期上发表。李广田先生在小说的后边还写了一则“附记”，郑重向读者推荐这一佳作。

发表在第八期上的两首诗《警报前后》和《奔波在长道上的马群》的作者是六中一分校的学生李崇宵（即现在的作家李方立同志）受到李广田先生的重视，《锻冶厂》用了较大篇幅予以发表。《锻冶厂》确实起到了锻炼一代青年茁壮成长的作用。

在四分校蓬蓬勃勃开展起来的抗日救亡运动基础上，一九三九年八、九月份，成都市委先后派去方敬、陈翔鹤、陶稷农三位共产党员教师。方敬到四分校后根据李广田老师的

介绍在进步同学中掌握了一批建党对象。一九三九年三台中心县委书记侯方岳同志到四分校后，经过考查了解，于是年底由方敬同志介绍，侯方岳同志批准，首先在学生中发展了张继乾、石仁厚、刘守身三人入党，建立了党小组，组长张继乾。

党小组成立后，在方敬同志指导下和三台中心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因势利导的通过读书会、剧团、壁报社等活动，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发展。党小组利用刘守身担任学生会主席的身份公开领导读书会的活动。他们把读书会成员分成若干小组，经常组织学习心得讨论会，时事座谈会。一九四〇年下半年，为便于更广泛的团结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又将“火炉”读书会与普育小学“野火”读书会合并。读书会的书籍来源，除由同学们自由投书外，一些家庭比较富裕的同学还自动捐款购置。他们还秘密与成都新华日报分馆及读书生活出版社联系。两社将一部份马列读物，包括毛主席著作和进步文艺书籍，分别以一九折和对半折的优惠价卖给他们。读书会拥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等，在学生中广为传阅的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社会发展简史》和鲁迅、茅盾、郭沫若以及苏联作家高尔基、

肖洛霍夫等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

校长孙东生主张自由讲学，也给托派活动以可乘之机。从三九年初至四〇年上期，该校托派活动猖獗。该校公民教员阎子桂读北大时就参加托派组织，是山东托派组织创始人之一，到四川后又是托派四川地委负责人之一，一九四七年秋去南京经上海逃往香港，一九五二年自香港去美国。他富有煽动性，能迷惑人，常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他上“公民”课时，可以公开讲里昂节耶夫的“政治经济学”，也讲国际国内形势。因此，颇得一些追求进步但又缺乏马列主义基本观点的师生的赏识。该校的“真理读书会”就在他的影响下组织起来的。为了把一部份真正追求真理的同学从托派思想影响下解脱出来，党小组充分利用“野火读书会”的组织，同托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阎当时散布的托派观点：一是攻击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是所谓毛泽东向国民党投降。在国际形势上不提苏联。讲国内形势不提共产党。二是，鼓吹我们当时的社会性质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否认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为揭露托派观点的反动性，他们在“读书会”里提出了三个题目展开辩论：一是“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二是“中国现在是什么性质的社会？”三是“列宁对‘左’派幼稚病的批

判是否正确？”（针对托派散布的列宁的批判是错误的）。每个读书小组，通过学习讨论和墙头报展开辩论。普育小学杨更生等进步师生，以“野火读书会”名义也出了一期取名《挡箭牌》的壁报批判托派观点，贴在四分校的墙上，支持四分校进步同学的斗争。到一九四〇年暑假，托派头子阎子桂终于被迫离开学校，到西安黄埔七分校当了国民党上校政治教官，至此，他的反动面目在师生中更完全的暴露了。

除读书会的活动外，党小组派石仁厚与普育小学进步教师严代泽、何伯英、唐小年联系，联合两校进步师生参加普育小学组织的“抗日巡回演出队”，深入到略坪、鄠加、文星等农村场镇宣传演出，把抗日救亡运动的火种播到农村。

四分校轰轰烈烈的抗日民主运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注意。从一九四〇年下半年以后公开进行迫害和镇压。逼走了方敬、陶履农，解聘了进步教师李广田、陈翔鸿。对四分校校长孙东生因纵容左翼师生之“罪过”被调离该校远奔青海。校长由训导主任丁用宾继任。校总部公开提出以“党团治校”的口号，并从梓潼一分校调来一个班的师生，全是三青团员并入该校。一九四〇年秋天又成立了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由校长丁用宾担任。四〇年一月总校又派人到四分校成立三青团区队，区队长是训育员张剑青。下设五个分队。